

开创中国新历史的指路之作 ——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哲学蕴涵

陆剑杰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江苏 南京 210001)

摘 要: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高度信任历史的创造者——人, 热切期望人们进一步行动起来去创造历史; 认为对于我国这场没有先例的实践创造活动, 最重要的是要按照我们对社会历史基本规律和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了解, 制定价值准则, 把握待创造的制度体系的功能性规定; 具体而历史地肯定和颂扬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 在谈经济发展时首先是谈主体需要, 并且是同主体需要结合起来考虑客观可能性; 他的“计划多一点, 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的判断蕴涵着哲学中存在“中性”范畴的原理。他在谈话中所表现出的乐观主义, 是对人类历史的绝对规律的确信, 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相对规律的乐观期待。

关键词: 邓小平; 南方谈话

中图分类号: A 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08(2002)03-0005-07

十年之前, 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的事业处于历史关口, 需要把握前进方向的时候,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 史称 1992 年春天的“南方谈话”。现在, 我们再读“南方谈话”, 就会发现它的两层含义。就显性层面说, 它全面而系统地回答了全党、全国关注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 成为邓小平理论达到成熟、形成体系的历史标志; 就隐性层面说, 它蕴涵了深刻的哲学思想, 其主题是论述人和人民群众如何才能不断创造新生活、新历史, 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崭新篇章。本文愿就后一方面谈一谈学习体会。

一、关于关键在人和走出历史的新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把人如实地看作历史创造者。马克思的如下论断, 对于排斥人的机械论历史观的影响而言, 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 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 ……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 不是‘历史’; 而正是人, 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机械论的历史观, 恰把“历史”当作人不参与其创造、只需要服从其规律的独立客体^{[1](p. 119)}。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洋溢着高度信任历史的创造者——人, 热切期望人们进一步行动起来去创造历史的激情。他多次强调: 你们要“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 去开辟一条历史的“好路”。

收稿日期: 2002 - 02 - 18

作者简介: 陆剑杰(1935-), 男,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

“新路”^[12](pp. 370-383) (以下未注出处的均引自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你们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邓小平的呼吁同马克思当年的论断就是这样一脉相承的啊!

邓小平把人创造自己的历史比做“走路”,这似乎并不新鲜。但丁说过,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鲁迅更说得明白,天下本无所谓路,路是人开辟出来的;走的人多了,就成为路。但邓小平的着力点在于:他相信人一定能走出“好路”、“新路”。就是说,一定能把历史推向前进,并为自己带来越来越多的福利。社会实践是交织着正确指导思想和错误指导思想、成功行为过程和失败行为过程的现实活动。从一时说,实践会走“坏路”、“旧路”、“错路”;然而从全程说,实践是一个有规律、合目的、向前行的过程。这里的关键在于:第一,实践者虽然具有主观意志和主体目的,并以此来规范实践。但是,主观意志和主体目的是在客观实践中产生并由社会存在的客观条件来决定的。正如列宁所说,“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有的、实有的。”^[13](p. 159)当代中国人的宏观目标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民族复兴,这个伟大目标完全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第二,实践者虽然具有选择所走道路的权利,并按此选择来展开自己的实践活动。但是,选择只能在客观现实所包含的可能性空间中进行。选择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实践必然失败;选择成功的机率低乃至极低的目标,失败的几率就高乃至极高,终于不能实现。只有选择客观条件比较充分、成功的可能性较大的目标,才能通过实践使之变成现实性。第三,实践既具有创造机制又具有纠错机制;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主体就会积累正确的认识,开辟正确的道路。那些自己的利益和社会进步要求背道而驰的社会集团,抗拒实践检验的结果,不能改变自己的目的和意图,那只能在实践检验之下被历史所淘汰。因此,邓小平一方面要求实践者具有大胆的创造精神,同时又指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他是深知实践发展的逻辑和人创造历史的道路的。就是这样:从现实出发,实践、选择、再实践、再选择,终于走成一条推动社会发展、满足人民需要的道路,而成功实践的轨迹正是贯彻其间的历史规律。

二、关于创造历史的价值导向和制度体制的现实建构

人从事社会实践、进行历史创造,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的社会实践指向对象世界,因为对象存在着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这种“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属性”之间的关系就是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认识客观地存在的价值关系,这是把握住了“价值真理”;规范实践活动所要创造的价值关系,它就成为“价值准则”;对于久远目标的追求,使人具有崇高的“价值理想”。由价值理想现实化而形成的价值准则,也就是待创造的新事物、新格局的功能规定。按照现代决策科学,同决策目标相统一的价值准则,是制定改造旧事物、创造新事物的行动方案的根据;而按照现代系统论,系统功能是要素、结构和环境的函数,把握住待建系统的功能,我们才能设置要素,安排结构,改善环境,把该系统建立起来。

邓小平肩负着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社会主义新制度、新体制的历史使命。在创造之初,谁也难以说清这一新制度、新体制的具体结构、现实状态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对于这样的没有先例的实践创造活动,最重要的是要按照我们对社会历史基本规律和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了解,制定价值准则,把握待创造的制度体制的功能性规定。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结构方

面,曾经讲过一些重要的原则。他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21](p. 137)}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21](p. 142)}但是,什么是“公有制”;又什么是“公有制为主体”;怎样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公有制?这样一些体制性问题是不能先验地回答的,必须经过一个探索、选择、创造的过程。为了正确有效地进行这种创造活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在此论中告诉人们:无论是怎样的体制,只有它能以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速度、更好的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它才能是社会主义;只有它在机制上和运行中能做到让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它才能是社会主义。我们要经过探索和总结,改革和开放,创造出具有这样功能的社会主义。这两个方面,即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方面,生产力成果归于人民方面,前者是社会历史的基本规律的反映,后者则是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二者相互结合起来构成创造性实践的价值导向或功能导向。有了这个导向,我们对于来自国外的体制、机制,就会有一个全面的分析,不至于盲目崇拜,照搬照套;有了这个导向,我们对于自己曾有的旧体制,就有一个深刻的判断,不至于只有诗人式的愤怒;有了这个导向,我们对于待建的体制和机制就会有选择的准则,不至于乱试乱碰。我们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因为这一体制在人类的现实状态下不能满足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我们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它具有合理配置资源、刺激人的积极性和实现社会相对公平的功能。我们不搞公有化,也不搞私有化,因为二者都不能单独实现社会主义应具有的价值和功能。

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领导者的历史责任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两个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1](p. 119)}第二个命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两个命题是相互区别的。第一个命题谈“人”与“历史”的关系,这个命题中的“创造”,英语为make,意为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历史;第二个命题谈人之中的人民群众和他的对立面的关系,这个命题中的“创造”,英语为create,意为人民群众推进了历史的发展。在社会上存在着对立的力量的时候,我们把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称为人民群众,由此提出了上面的第二个命题。再就人民群众而言,他的组织成为社会力量的时候必有领导者,以此形成、体现和实行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人,也谈人民群众,谈作为领导者的党和党的干部的历史作用。他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具体而历史地肯定和颂扬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他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在中国农村,早先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是农民创造的;现在乡镇企业的改制发展,包括出现江苏江阴的“上市公司板块”也是农民创造的;像江阴华西村那样的社会主义的又日趋发达的先进典型,还是农民创造的。古巴革命家何塞·马丁说:领导者只能“领”着群众走,而不能“拖”着群众走。邓小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他是严格地尊重群众、热心地引导群众的杰出人物。邓小平在位时,不搞争论,他坚信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也坚信只有通过实践及其对思想的检验,才能发扬正确思想,克服错误思想,提高觉悟,统一认识;不搞个人崇拜,不许人吹捧他。他在1992年读十四大报告送审稿之后告诫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

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4](pp. 30-31)}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大潮中,领导者只能起这个作用。不到群众的实践中去,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形成决策,推动工作,那是失职;但“过犹不及”,如果想超过这种作用来发号施令,那只会迟误以至破坏历史的发展。

四、关于推进历史创造过程的主体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

历史创造过程是人的实践过程,“实践”是一个关系范畴。关系方之一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因为人是实践行为的发动者、创造事物的能动者、人与对象的关系的调控者,所以,人是实践的主体。关系方之二为人的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及其环境。相对于主体,客观存在的对象及其环境是实践的客体。实践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是由主体与客体之对立到达主体与客体之统一的过程。作为社会实践实况的哲学表现,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确立了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之统一的概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象、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p. 54)}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转变哲学观念,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事物,因而世界不是无人的单纯客观世界,而是人在其中活动并加以改造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观就是主体性世界观。所谓“主体性原则”,除了把世界理解为人作为主体在其中活动并加以改造的世界以外,还肯定人在这样的活动中具有目的主动性、创造的能动性、获得人之自由的超越性。但是,主体在从事实践活动的时候,既成对象世界却不是人可以选择的。在承认人的主体性的条件下,承认对象世界的既成性与客观性,这就是与主体性原则同时存在的客观性原则。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用自己的语言坚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两个根本原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益和质量的问题上,邓小平正是这样做的。他谈经济发展首先是谈主体需要,而不是如有的人那样只谈可能性、可靠性、可行性,如果光谈这一点,当然是慢一些好,因为这样干起来更稳妥、更可靠。邓小平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社会主义选择的正确性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问题。如果我们同周边国家或地区比经济是“龟兔赛跑”式的比较,老百姓为什么还要你这种社会主义呢?当然,这是从政治上看问题,但同时也是从哲学上看问题,从是否坚持主体性原则上看问题。主体性原则同时也要求客观性原则。因此,首先考虑需要并不是说不要考虑可能,而是同需要结合起来考虑可能,它是主体需要之是否得到满足的可能,而不是单纯的无主体性的可能。邓小平正是这样来想问题的,他对较高速度的客观可能性问题作了论证。他说:“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而“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邓小平把主体需要和客观条件结合起来作出结论说:“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五、关于体制创新中的中性范畴和极性范畴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的主体作用集中地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新体制的建构。邓小平面对两项他所不能选择的客观条件。其一,世界性的条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多年的发展经验表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运动中不可超越的阶段,而市场经济自身又有其自我调整、改革与进步的过程。西方经济学界都已经接受了“市场失灵”的概念。资本主义各国通过“国家干预”,缓解了市场所具有的消极作用,使自由市场经济演变成有自觉调控的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制度得以生存和发展。其二,中国的条件,中国通过胜利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由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成功地创造出来的。如果主观地强行改变这条道路,就会造成社会的振荡、动乱,使社会的经济发展遭到破坏。邓小平面对这两项客观条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后一段话的前半句描述的是当代的、经过了改革的资本主义;后半句是规范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到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

邓小平的判断蕴涵着一个哲学原理,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中性范畴和极性范畴的原理。在两个具有对立性的事物体系中,标志它们的对立性的只是一部分要素,一部分机制,而二者的大部分要素、大部分机制却是共存的、通用的、可以互相移植的。“计划”、“市场”正是这样的范畴。这种范畴成为中性范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实存形态是私人资本,生产资料完全归私人资本家所占有,工人则完全没有生产资料。这时的市场经济是紧紧地同私人资本的私有制结合在一起并以后者为基础的。到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后期,出现了股份制和以此为占有方式的大型企业。这样的企业存在着最终所有者多元但企业治理又必须一元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找到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这就是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组建法人治理结构,为最终所有者代行管理之职。一经出现这种所有权二重化的制度和机制,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可以通过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而进入市场,这时,市场才成为不专门姓“资”的中性经济范畴,才能与社会主义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所必走的道路,而且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将来过渡到发达社会主义的桥梁。

六、关于人类历史的规律和命运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创造论和决定论相统一的历史观。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民群众推动的。人的意志、人民群众的意志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但是,社会实践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的性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逻辑是: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实践是人的本质、人的存在方式,人必然是实践的;在生产劳动实践中,人同自然界发生必然的关系,人在处理这种关系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智能和实践能力,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在生产劳动实践中,人同人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必然地同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展开,显示为一个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过程,它们作为经济基础又同社会的上层建筑发生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必然带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更替;人在实践的长程中必然地改变着自己的本性,跨过群本位的相互依赖、相对不自由的社会历史时期,超越个人本位的在依赖于物条件下的独立性的社会历史时期,人类必然要前进到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摆脱了由生产力发展不足

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和罪恶、人真正获得自由个性的未来。所有这些,是人类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邓小平在其“南方谈话”中对人类进步的事业及其未来是满怀着信心的。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会经历曲折,但社会主义事业会“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规律是在现实中形成和展开的,而真正的现实都带着偶然性,带着复杂的变量和特殊的条件,规律是在这种偶然性中开辟道路的。在现实的历史中,任何民族、任何集团、任何个人就都存在“命运”问题。“命运”和“规律”不同。“命运”讲的是人在历史中所遭遇的成败、存亡的可能性及其转变为现实性的概率的波动;“规律”讲的却是客观必然性。但“命运”与“规律”又有紧密的联系,因为就具体实践中的相对规律而言,规律的必然性正是由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而成的。因此也可以说,“命运”涉及的是历史发展的统计分布的规律,而社会历史规律则由实践成功几率的提升直到几率为“1”而显现的。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表现的乐观主义,就对人类历史的绝对规律(它不具有统计性)而言,是一种绝对的确信;就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相对规律而言,则是一种统计性的期待,是对中国人民命运的乐观估计。因为他自己讲过:改革开放都有风险,“中国也可能会出些问题”^{[2](p. 99)}。“命运”作为一种可能性的结构,必定把主体的行为能力包含在内。马基雅弗里曾经说,不能认为“在人世事务上辛劳是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我们决“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我认为,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的一半归我们自己支配。”^{[6](pp. 117-118)}比较排斥人的宿命论的“命运”观,这里有一个质的进步,然而“半”对“半”的论点依然是不科学的。今天,我们用可能性或概率来了解“命运”;对于可能性之增长和最后转化为现实性,主体努力具有关键的以至决定的意义。人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的。

在1992年以后,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础上,“捅破窗户纸”,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作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进行改革的决策。这些年来,按照这样的理论和政策,我国大大深化了改革,扩大了开放,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有成效地学习和实行对市场经济的客观调控,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与此同时,在改革深化、发展和加快并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中,社会消极现象也有很大增长。主要是党内腐败现象迅速蔓延,扼而不止,使党群关系遭到空前严重的危害;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工人、农民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了大规模的弱势群体,使人民内部矛盾尖锐化;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显著动摇,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景感到心中无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针对这样的实际情况,中央大力加强法制建设,严厉打击腐败现象,强化反腐败的体制创构,抓紧干部培养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显著成绩。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江泽民同志于2000年春天,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2001年7月1日,又作了阐释这一重要思想的报告。应该说,“南方谈话”以后,在“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思想的指引下,思想大大解放,改革深入推进,经济显著发展,社会又保持稳定;目前和今后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建设。我以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方法论上继承了“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给社会主义作了功能定位,制定了价值准则,从而放开了人们的手脚,向社会主义新模式挺进,使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现在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党的建设的问题同样进行了功能定位,制定了价值准则,引导全党以“三个代表”为准则,用改革态度对待党的建设。“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在理论学说上则形成了适用于新世纪的党建思想,解决了过去尚未解决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问题。同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全局也具有重大的创新价值和指导意义。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党正在致力于解决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创新问题,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科学分析问题,从而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团结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第三步战略目标——建设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中国的历史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2000年江泽民“南方讲话”(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正在创造自己的新历史。在这样的時候,重提“南方谈话”这部“中国人民开创新历史的指路之作”,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十分明确的是:人们创造历史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忘记从世情、国情的实际情况出发;都不要忘记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是唯一正确的价值导向;都不要忘记我们所作的一切选择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都不要忘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作为一项规律仍然具有统计性,中国的前途仍然充满风险,中国人民的命运仍有待于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坚韧奋斗,通过实践去创造条件方能实现胜利的结局。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 [3] 列宁全集(第55卷)[M]。人民出版社,1995
- [4]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Z]。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 [6] 马基雅弗里 君主论[M]。商务印书馆,1985

(责任编辑:吴增基)

A Guiding Star for Ushering in a New Age in Chinese History

——On the Philosophic Implication of Deng Xiaoping's "South Talk"

LU Jian-jie

(The Party School of Nanji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of CPC, Nanjing 210001, China)

Abstract: Deng Xiaoping highly trusted the creator of history——humanbeings in "South Talk" and ardently expected people to take more action to create the history; in his viewpoint, to this creative practice with no preceden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set the value criterion according to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basic law of social history and the demand of people's interest; he confirmed and extolled particularly and historically the mass's value as the creator of history; when talk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demand of main body should be referred to at first, besides, it should be combined together with the demand to consider the objective possibility. The optimism he showed in the talk is a kind of trust on absolute law of humanbeing's history, and also is a kind of optimistic prospect on the relative law of Chinese Socialist undertakings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South Talk